

# 顺从与反抗:青少年的自我认同及其整合

## ——社会工作对平权型亲子关系的倡导性实践

佟 新

---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4个有关成长困境青少年的家庭社会工作案例,运用自我认同、精神分析和权力关系的理论,分析家庭关系类型对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影响。本研究分析发现,所谓的问题青少年正是处于成长困境中的青少年,他们在父权制家庭关系中形成了矛盾的自我,并用消极反抗来表达自我。研究认为,青少年在强势父亲的客体化询唤下变成了服从式的主体;不在场的父权更具有隐藏性。沉默的母亲则产生了青少年否定性的自我。积极的家庭社会工作实践是通过重建家庭关系,树立青少年自主意识、自我尊严和自我承诺的积极自我。平权型家庭关系理念的推广对家庭和谐建设和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 成长困境青少年 父权制家庭关系 社会工作 平权型亲子关系

---

DOI:10.16091/j.cnki.cn32-1308/c.2022.01.011

### 问题的提出

2021年5月,第一个有关中国少年儿童精神疾病患病率的流调报告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该研究综合考虑地理分区、经济发展和城乡因素,对北京、辽宁、江苏、湖南、四川五个省(市)的儿童、青少年进行了多级整群分层随机抽样调查,共计样本为73992名年龄在6至16岁的参与者。调查结果显示:在6至16岁的在校学生中,儿童、青少年的精神障碍总患病率为17.5%,其中,流行程度最高的精神障碍包括: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占6.4%、焦虑障碍占4.7%、对立违抗障碍占3.6%、抑郁障碍占3.0%、抽动障碍占2.5%。半数精神问题在14岁之前已初露端倪,而在24岁之前,这些问题中的75%已经显露出来。该调查还发现,性别之间的精神疾病患病率统计有显著差异,男性组的精神疾病的患病率随着年龄的增

长而降低,女性组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城乡间没有差异。总之,儿童、青少年精神疾病的患病率达到了中国有史以来最高值。<sup>①</sup>从青少年社会工作的视角看,对青少年精神疾病的定义要慎之又慎,要警惕将青少年遭遇的各种困境病理化,同时也要加强对青少年身心健康的积极干预性研究和实践工作。

有研究用“问题青少年”的概念来讨论青少年的越轨与犯罪行为,期望用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方式深入探索问题青少年的发生机理和机制。<sup>②</sup>“问题青少年”是站在社会视角所作的命名。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往往会遭遇诸多成长困境,本文将其称为“成长困境青少年”,即青春期因多种原因在心理、认知和行为方面遇到困难青少年。青少年社会工作的目的是激发青少年自我发展和自我成长的潜能,帮助处于成长困境中的青少年成长,其特点是以青少年为主体。

青春期是青少年自我形成的关键期,处于这一年龄阶段的青少年,生理逐渐成熟、心理正在发育,对世界充满好奇,有着强烈的求知欲。青春期又是青少年的自我成长期,要求自我独立,同时又充满矛盾与风险;他们要为承担社会责任做准备,但又没有正式的社会角色和经济能力。因此,出现青春期危机是一种常态。所谓青春期危机是指青少年在遇到挫折时出现的无所适从、逃避、越轨甚至自杀等多种心理失调和社会关系失调的现象。社会关系因素,特别是青少年所处的家庭关系、师生关系、伙伴关系等多重社会关系,是青春期危机产生和解除的重要因素。因此要从社会学的层面理解和认识当今青少年的身心成长问题,并在社会工作的实践中进行积极的干预。

在现代性的视角下,青少年问题常常被视为年轻一代在个体化转变过程中呈现出的不适应状态。但更应当看到,个体化过程作为一个必然的社会现象,它是发生在具体的社会情景中的。作为个体的青少年的自我的生成也是发生在家庭系统和学校系统等传统权威体制中的,这是一个艰难且艰巨的过程。多种研究表明,家庭中的亲子关系是影响青少年自我认同的重要因素。中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之中,家庭中的传统文化与观念正面临价值观念的挑战,且在人口转变和社会变迁等因素的影响下,家庭结构、家庭功能和家庭关系类型也随之发生相应的改变。变化中家庭代际间价值观念和认知的矛盾冲突可能是作用于青少年的身心成长与自我认同的关键因素。本文以亲子关系为切入点,关注问题青少年自我的形成与特点,从家庭社会工作的案例出发,运用自我认同、精神分析和权力关系的理论,透视青春期危机的特点,分析青少年矛盾性自我认同的形成机制,指出通过平权型家庭关系的重建对青少年自主意识和自我尊严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 文献回顾

对青少年自我认同的研究有诸多视角。埃里克森在《童年与社会》中指出,自我认同中的“基本信任对基本不信任”的主题构成了生活的核心问题,真正的核心冲突是母亲和父亲角色之间的冲突。人类的救赎有赖于充满人性的母性和父性

关怀达到平衡和成熟。<sup>③</sup>本文首先回顾家庭关系对青少年自我认同的相关研究文献。

关于抚育模式和抚育模式转型的研究。西方社会经历了一个从传统父母控制的抚育向现代抚育的转变过程。传统的抚育方式有两个特点,一是在规范与自由之间建立恰当的关系;二是父母在抚育过程中的权力一直被视为是不言而喻和不容置疑的事实。现代抚育表现为对个人自由的重视。从20世纪初开始,陪伴式的家庭模式日渐成为主流,私领域的情感民主成为理想的亲密关系情境,这不仅是对两性关系的文化期待,也是对亲子关系的要求。父母的权威不再被视为天经地义,而成为被反思、被质疑的对象。对美国家庭教育的研究发现,与父辈相比,当代的父母们发现他们越来越处在规范与自由、权威与天性的内在张力中,养育子女不再像以往那样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事,而是涉及多重因素考量的文化事项。父母不得不运用权威,同时又要掩盖权威。<sup>④</sup>在民主化转型的过程中,父母们常常处于矛盾状态,一方面父母对于控制孩子在道德上感到不正确;另一方面,父母仍然是抚育子女的主要责任方,社会要求父母要按标准完成抚育责任。“消失的父亲、焦虑的母亲和失控的孩子”的状况在全球范围内均有不同程度的表现,而建设共担养育责任的平等关系也具有普遍意义。<sup>⑤</sup>

对中国抚育模式的研究呈现出对社会转型的关注。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中指出,家庭的首要功能在于为社会培养合格的成员,要为社会解决“个人有生死,社会须持续”的问题,由此建立双系抚育。<sup>⑥</sup>周飞舟则指出,中国传统社会的基础是“一体本位”,一体的思想源于“一本”的思想意识,即以父母为本,一体是指“父子一体”“母子一体”。这与西方社会的父母角色的冲突观念完全不同,这种深层的社会意识构成以“孝”为本的社会伦理体系。<sup>⑦</sup>由此,中国家庭教养的传统表现为要求儿童奉行一套“成人中心”的价值体系,不仅主张成人在儿童生活中具有优先地位,也主张成人拥有管教儿童的绝对权威。但祖父母和母亲们也给予了孩童很多的关爱和照护。<sup>⑧</sup>

随着人口变迁和家庭结构的变化,中国社会的抚育模式也发生了重要变化。2020年第7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一个家庭平均只有2.62

人,家庭规模大大缩小。人口再生产功能持续下降,总和生育率仅为1.3。低生育率的现实表明,人们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已经由“重生”转向“重养”,“重养”带来的过度育儿、密集母职减损了生儿育女的幸福感和满足感。<sup>⑨</sup>这种变化并非如西方社会那样,缘于养育的民主化,而是代际间重心的转移,即向着以孩子为中心的转变。在教养的家庭分工上,母亲在育儿中的作用和意义被高度强化。随着教育竞争的持续加剧,一种以孩子为中心,母亲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的“密集型育儿”方式成为当代家庭教养方式的主流趋势,主要表现为重视孩子的成就价值、强调母亲的教育职责。这种教育方式在各个阶层均有不同程度的卷入。<sup>⑩</sup>有学者从情感投入、价值判断与行动逻辑的差异分辨出现实生活中四种家庭教养实践模式:恩威并施型、谨慎规划型、丛林法则型与束手无策型。<sup>⑪</sup>不少研究注意到在城乡之间和阶层之间存在着教养模式的差异。我国农村家庭或低阶层家庭更可能采取放纵或专制型教养方式;而城市或高阶层的家庭更倾向于使用权威或民主型的教养方式。<sup>⑫</sup>

青少年社会工作需要站在青少年立场上的研究。高万红通过情感、权力和人际沟通三个维度对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亲子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青少年的抑郁症是其应对压力的一种方式,其形成机制是青少年在个体发展中的人格缺点、人际关系(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和社会转型过程中遭遇的各种压力综合作用的结果。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在亲子关系当中经历了“非亲化”和“多重失去”的过程,由此形成了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亲子关系与抑郁症之间的双向作用。<sup>⑬</sup>法国学者对抑郁症的研究也有类似的结论,抑郁症来自于无限欲求与有限自我的张力,它是个体对抗被动个体化的自卫机能的显现。<sup>⑭</sup>

总之,各类研究虽然看到了社会转型带来的抚育关系的变化及其对青少年自我身份认同的潜在影响,但研究缺少综合性的视角,即父母和青少年构成的亲子关系是处于不断变动之中的,关于变动的关系对人们心灵的作用,研究还不够多;民主化进程对青少年自我身份认同的意义,也缺乏应有的关注。同时,对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研究结论还需要在更为普遍的意义之上加以讨论;更为

重要的是,社会工作实务需要建设性的思想、意见和方法。本文将从家庭系统理论出发,从精神分析的视角关注父母与子女的权力关系,思考这种权力关系在怎样的意义上作用于青少年的自我认同。

### 研究的基本理论与研究方法

家庭系统理论认为,家庭成员之间是相互依存的系统。同时,家庭又是社会系统的一部分,受到社会文化和价值观的影响。家庭中父母的思想、感受与行为会反映在家庭环境中,经由垂直的亲子关系影响到孩子的价值观、情绪和人际关系的互动模式,父亲和母亲身为引导者与陪伴者是重要的他人。家庭也是一个自我矫正的系统,家庭成员的改变将会影响其他成员。家庭危机会破坏家庭的内部平衡,但是在危机过后,家庭会重新调整自己的规则、行为和互动模式,产生新的关系模式。<sup>⑮</sup>这将指导本研究思考家庭系统改变的可能性。

青少年的自我是在家庭系统和社会系统中生成的,但父母是最重要的他人。埃里克森认为,文化和文化差异塑造了个体的发展。个人与社会相互渗透,个体的心灵是在特定文化背景的要求以及价值判断中产生和形成的。个体在生活中寻找意义和连续性的努力又影响文化和历史的变化。传统的精神分析观点认为本能驱力是心灵的原材料,通过外界社会力量的塑造和打磨形成心灵。埃里克森则认为是文化和历史赋予人类心灵以生命,他认为自我与驱力一样,经历了一系列的阶段与危机,这些危机在基本信任缺乏、自主性与羞耻和怀疑、主动与内疚、勤奋与自卑、认同与角色混乱、亲密与孤独、繁衍与停滞、自我整合与绝望之间寻找出路,在应对危机中自我得以建立、破坏或毁灭。<sup>⑯</sup>这启示本研究始终关注一个问题,即在中国特有的以孝为中心的权威式父子关系中,当亲子关系缺乏基本信任时,青少年的身心反应是怎样的。同时,本研究也注意到,这一代青少年已然是在互联网的多元信息轰炸下成长起来的,那么技术条件对他们的身心成长具有何种影响。

在传统的抚育关系中,亲子关系是父代具有全面的合法权力,是教养关系的核心。本研究用“权力的精神生活”的概念讨论青少年主体如何在服从、抵抗和重新指称中产生。“一个人只有

通过服从于一种权力,一种意味着根本的依赖的服从,才可占据这种自主权的形象。”<sup>①</sup> 亲子关系中的权力是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突显的存在,青少年的主体性在服从的过程中被唤醒,经过询唤,主体得以产生。从青少年的立场出发,本研究可拓展由福柯、阿尔杜塞和巴特勒讨论的主体性的矛盾性,分析中国传统父权制的家庭关系对青少年生成分裂的自我的意义。

研究样本为 2018 年以来本人进行的付费(费用是每小时 500 元,一般一次为 1 个半小时至 2 个小时)亲子关系咨询。在咨询过程中,我发现了 4 个典型的案例,他们的共性是存在着父权制的家庭关系模式,强权型的父亲与子女之间形成亲子间统治—顺从的关系,同时,母亲矛盾性的角色具有重要的符号意义,导致青少年形成矛盾、怀疑和分裂的自我。因此,问题青少年形成的关键并非缘于青少年自身,而是其所处的家庭系统;通过改善父权制的家庭关系,建立个性独立、有尊严、能协商的平权型的家庭关系,将会鼓励问题青少年找到积极的、内在一致的、有尊严的自我。

这些案主全部为女性,以妈妈为主,皆是为了“儿子的学习”问题而来求助。这些家庭都生活在大中城市。儿子的学习危机主要表现为青春期的男孩子不想读书、逃学、厌学、打游戏甚至自杀等行为。其基本情况如表 1。

表 1 样本基本情况(皆为化名)

编号	案主的家庭角色	亲子情况	相关问题
1	王刚妈妈	王刚,男,16岁,高一	逃学去打游戏
2	刘西妈妈	刘西,男,18岁,高三	计划自杀
3	张新妈妈和已婚姐姐	张新,男,19岁,国外大学预科	出国读高中,一直没有通过大学入学考试,抑郁症,有过自杀行为
4	李勤妈妈	李勤,男,15岁,初三	可保送重点高中,现表示不再上学

### 成长困境青少年: 矛盾的自我认同与形成机制

#### (一) 案例分析: 成长困境青少年的境遇

##### 案例 1: 逃学的高中生

王刚妈妈是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受过大学教育。王刚家非常重视对王刚的培养,妈妈也很重视陪伴孩子。在学业上,王刚的表现一直不错,学钢琴,考到了 7 级。但是因为中考失利,差 3 分没有进入到当地的重点高中。对此,王刚爸爸很

不满意,为了儿子继续读好一点的高中,花了高额的费用,借读到了市里一所声誉很好的中学的特殊班。班里孩子大都是离录取线差几分而花钱来上学的。自打进入高中后,王刚就非常不喜欢这个班,还经常逃学。在期末考试中,有两门课没有考及格。妈妈表示,这个班的老师不怎么管学生。为了强迫王刚去上课,家里雇了人陪他到学校,但没有想到的是,陪伴的人一走,他也离开学校,到网吧打游戏去了。王刚的妈妈非常着急,“不知道孩子的未来怎么办”。

王刚的诉求很简单,就是不要在这所重点中学借读,还是回到原来的学校,虽然不是重点学校,但同学们都熟悉和成绩相当。

王刚爸爸的态度很坚决,说花了那么多钱,就一定要在这里学下去,要坚持到高考。孩子不去上学是妈妈的问题,妈妈要想办法让孩子去上学!

当问及爸爸是否会和孩子好好交流的问题时,妈妈表示,爸爸从来不管孩子的事儿。妈妈说自打生育了王刚之后,她与丈夫就处于分居状态。丈夫忙于工作,有着很大的企业,几乎没有休息日。实际上,孩子是在婆婆身边长大的,妈妈白天上班,晚上回婆婆家。

王刚的心声是“我自己并不是厌学,只是不适应这个学校,而且特别反感父亲说的话,父亲的话是‘我不需要你有怎样的成绩或分数,你只需要坐着听课就行,这有什么压力?’坐着听课身体上是没压力啊,那心里就没有吗?我是借读的,成绩不如人家,我能没压力?如果说我真的没压力,我至于请假嘛,你看我初中请过几次假?为什么没有几次,很简单,有许多人和我水平相当,这样有良性竞争。在原来的学校,大家水平差不多,压力与喜悦并存,但在这儿只有压力,我请个假释放一下有什么问题!”

王刚还表示“我是用手机用到了凌晨,但绝大部分是看球赛。知道为什么凌晨看球赛吗?因为欧洲和我们差了十几个小时,那么为什么要凌晨看呢?只有一个原因:解压。做自己喜欢的事才能真正释放自己,我熬夜看个球赛甚至比睡了一觉更舒服。课上一堆东西我消化不了就用手机搜,自己学习,可你们非要把这理解为沉迷手机,我能受得了?总之,借读不是对每个人都有用,如果我在原来的学校就绝对没有以上这些事,成绩

或许比现在好,但又能怎样呢?只有你们理解了,我才能想上课。”

#### 案例 2: 计划自杀的高三学生

刘西妈妈在一次打扫卫生时,看到了儿子的日记,日记里写着各种自杀计划。妈妈吓坏了,她表示,偷看孩子的日记,知道这样不合适,因此不敢跟儿子讨论相关问题。妈妈是个受过大学教育、有着稳定工作的女性。刘西学习一直非常优异,在重点学校读高三。刘西妈妈从来没有想到过儿子想自杀,而且一点不像开玩笑,因为她感受到儿子是在准备着。具体的问题大致有三个方面。第一,他们夫妻感情不算太好,妈妈一直忍着,一切听父亲的。因为妈妈觉得也没有什么好争的,就听他的吧。儿子一直以父亲为榜样,因为父亲是个事业上很成功的人。但最近父亲遇到一些问题,变得很焦躁。为了孩子上学,他们在离学校比较近的地方租了房子,但爸爸并没有和他们住在一起。父母见面时常常会发生口角。在妈妈和爸爸冲突的过程中,儿子对妈妈非常不满,认为妈妈过于软弱,太迁就爸爸了。在儿子眼里,妈妈的人生是失败的人生。第二,在高二的时候,儿子认为不知道什么原因和老师产生了矛盾,一直认为老师处处跟他过不去,在这个关系中,自己就像是妈妈,软弱、无力,任人宰割。这是他非常不喜欢,也是不想要的人生。第三,就是恋爱问题。他认为自己有虐恋的倾向,虐待爱的人才会有性快感。因为特别喜欢一个女孩,但又知道自己的性偏好,因此觉得自己的一生也不会遇到爱情,会终生不快乐。因此,这样的人生是自己不想要的,还是自杀吧,只是采用怎样的自杀方式是个问题。

#### 案例 3: 一个不想出国的高中生

首先是张新的姐姐来求助的。春节期间,在国外读书的弟弟回国了。到快要开学的时候,弟弟跟姐姐说,他真的不想出国了,要出国他会死的。张新说,跟他一起出国的同学,有的回国了,有的考进大学了,现在在国外一个朋友都没有。他的英语不行,过不了关,进不了大学,因为他根本就不想学英语。到了国外就是天天吃饭睡觉,出国的头三个月,体重增加了 20 公斤。这样的日子没法过。有一次开着车,直接就撞墙了。他说,他就是冲动,才一头撞到墙上的。后来,朋友劝他看医生,诊断为抑郁症,开始吃药。他说,他不能

出国了,出去就想死。他希望自己能够留在国内,跟着父亲学做生意。但是父母不相信他有病,觉得这只是他想留在国内的借口。张新爸爸的要求很简单,花了那么多钱,怎么也要读个学位回来。张新的爸爸是个成功的企业家,他认为身边朋友的孩子都到国外“镀金”了,自己的孩子怎么也应该拿个文凭回来。张新妈妈说,“大概从小学五年级起,他就开始说谎,拿别人的考试成绩当成自己的,他说生病就是吓唬人。”

姐姐在求助的过程中揭示了家庭环境的问题。“父亲一直是我心中的英雄,我很爱他。但在读大学时,妈妈经常会打电话与我哭诉和爸爸吵架,原因是怀疑父亲有外遇。我一边安慰母亲,一边相信父亲很爱我的母亲。因为母亲一直没有工作,我甚至怀疑母亲太多疑。但是后来我知道父亲真的有小三、小四存在,才发现父亲虽然爱这个家,但是他太男权了,他主宰一切,包括我们的命运。他安排我的工作。他安排弟弟出国,那他就必须出国,我觉得弟弟太可怜了。我看到他吃药,看他哭。我要弟弟留下来,其实弟弟和叔叔一起学习做生意会很好,但父亲觉得这样他很丢人。”

#### 案例 4: 不想保送高中的初三学生

李勤妈妈是个艺术工作者,有自己的事业。儿子学习成绩优异,以他的成绩可以免试进入当地重点高中。但是她说,不知道为什么,儿子表示他不想读书了,想出去看世界,想自己养活自己。笔者一再追问李勤妈妈“最近有什么事发生了”“一定有事情吧”,妈妈才说“家里是出现了点问题。我发现丈夫在外面不仅有其他女人,还有个孩子,而且孩子已经上小学了。我一直不知道,只以为丈夫工作忙,不回家很正常。但没想过他在外面有个家。我不知道怎么办。我一直忍着,想孩子上了大学我再离婚。总想着再忍忍。可能是儿子知道了这事。反正是他变了。他表示不再上学,要离开。”

李勤爸爸也是事业有成,他对儿子充满期待,并不想离婚。因此,李勤妈妈决定为了孩子忍受一下丈夫的背叛。她告诉笔者,最近儿子知道了这件事,然后他就提出不上学了,想要离开这里,自己打工去。

总结这 4 个案例,可以发现:第一,这 4 个青少年皆遇到了人生大事,处于青春期的成长困境

中。他们不是“问题青少年”,而是特别需要理解、倾听、共情、讨论他们前途和获得支持的青少年。第二,他们的共同点是处于父权制的家庭关系中,他们都有一位事业有成的父亲,虽然父亲在亲子抚育中常常是不在场的,但却对儿子的人生做出被社会认为可能是最好的安排。在父权制家庭关系中,父母关系紧张,但母亲皆对丈夫的权威采取了默认的态度,且父亲一直是家庭经济的重要来源。第三,在父亲的安排下,这几个青少年的表现是顺从的,但又在服从的过程中做出了各种反抗,这些反抗是消极的,以逃学、退学、自杀、抑郁等为主要特征。这反映出青少年自我的矛盾性,他们在顺从与反抗之间经历着痛苦的挣扎,甚至存在着分裂的自我。“分裂的自我”常常被认为是疯狂的代名词,<sup>⑮</sup>本文选用矛盾的自我以减少其病理化的面相,但走向自杀的青少年确是有着某种程度的分裂的自我。

求助的母亲们皆没有讨论家庭关系的问题,只有那位陪母亲来的姐姐清醒地意识到“父母的关系有问题,父母不了解孩子,他们只是一味地想要孩子按自己的要求去学习”。在母亲的眼中,自己的孩子有了问题,她们渴望有“妙方”能立即解决孩子的问题。由此可以看出青春期成长困境中的青少年是如何变成了“问题青少年”。

#### (二) 青少年顺从的自我: 询唤中主体性的生产

从青少年的立场出发,思考青少年矛盾的自我,必然要关注其主体性。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这4个案例中的亲子关系都是以父母为中心的模式。当父母对孩子的行为发出客体化的询唤时,青少年在询唤中发现了自我,发现了自己的诉求和主体的存在。这令人想起巴金在20世纪30年代写的小说《家》,年轻人为了要掌握自己的命运而痛苦,而这种痛苦正是主体不断反思、觉醒和成长的代名词。

案例1中的王刚,父亲的质询是“我不需要你有怎样的成绩或分数,你只需要坐着听课就行,这有什么压力?”这种询唤有效地促成了青少年反思和反叛性的自我意识。在“我”与“你”之间权力的边界通过话语提醒青少年要在顺从与反抗之间做出二元对立的选择,这两个选择都是权力的表现形式。与现代民主化的平权家庭关系相反,在这一传统的父权制关系中父母具有自上而下的

权力合法性,呈现了父权对子代的控制。

朱蒂斯·巴特勒将阿尔杜塞的询唤理论和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相结合,指出当人们在追求“自己”是谁,即自己作为主体的构成时,人们必须依赖另外一个人的权力,这个权力习惯性地被想象为一种来自外部的、压迫主体的东西,是使主体屈从、下置并降级为一种较低等的东西。如果人们认为权力同时形成了主体,并提供了它存在的条件和欲望的轨道,那么权力就不单单是人们要对抗的东西,同时也是人们要依靠的东西。服从意味着被权力屈从的过程,同时也是成为一个主体的过程。当王刚不得不顺从父亲到一所重点中学借读时,他作为“主体”是屈从于父亲权力的。但这一屈从亦蕴育了反抗。正如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中所说,压抑(repression)和管制(regulation)不仅形成了良心和内疚的重叠现象,而且良心和内疚对主体的形成、存留和延续都是必要的。起初作为外在的、对主体进行压制出现的权力,是使主体进入屈从状态的权力,都采用了一种构成自我的自我认同的精神形式。这是一种自我的开启。<sup>⑯</sup>因此,父亲的权威既生产了儿子顺从的主体,同时也生产了反抗的主体。青少年在被客体化的询唤过程中,开创了自己的权力空间,但在顺从的前提下,反抗常常是消极的,如逃避、抑郁和自杀。在询唤中,权力被成功地指认和服从,作为服从的主体,权力对青少年产生的影响是无所不在的,深入到人的身体和灵魂。借读重点中学或出国留学,在他人眼中是难得与美好,对于服从的主体则是无时无刻不在的羞耻。巴特勒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在无意识的层面上发现一种对服从的依恋,什么样的抵抗会从这样的依恋中被制造出来?”<sup>⑰</sup>其结果是复杂的。但是在上述案例中,特别是在第1和第3个案例中,可以看到服从与反抗的反复过程。青少年被重新规范化,被再次要求服从,且是被贬损的对象。这两个案例中的父亲都表示,儿子学习成绩怎样并不重要,但是“要把书读下来,学业要完成”。青少年在家长做出的选择中实践着重复性的服从,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学会了对服从的依恋,并在权力的创伤中存活。

#### (三) 发现之二: 父亲不在场的家庭父权制

现当代社会,各种话语总是谈及在家庭教育

中父亲消失的“丧偶式育儿”,视其为密集母职或矮化母亲角色的现实。<sup>②1</sup>然而更应该关注到的是,父亲的不在场并不意味着父权的消失,父亲不在场的父权制家庭关系往往更具有隐蔽性。

父权制家庭关系也可称为家长制家庭,它是人类历史上普遍存在过的一种家庭关系类型。在现代民主化进程中,这一家庭关系正向着伙伴型家庭关系转变。<sup>②2</sup>父权制首先是一种意识形态,以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离和等级化劳动性别分工为基础,它分别将男人和女人的活动空间作为工作场所和家庭。因此,男人/父亲们将更多的时间花在工作上,有更多的机会和时间参与政治与市场的公共活动;女性则承担照料孩子、做饭等各类与人的再生产相关的工作,更多的时间花在家人和孩子身上。在现实生活中,父权制是弥散的。在父权制家庭关系中,父亲在家庭中享有家庭财产的支配权、家务管理权、对子女的惩戒权等。

在这4个案例中,家庭关系的特点是典型的父权制,其存在的条件之一是父亲事业有成。更为重要的是,成功的父亲都是或曾经是孩子心目中的英雄和榜样,是自己未来想成为的人。因此青少年矛盾的或分裂的自我存在于父权制家庭关系的日常生活中,且父权制的存续具有再生产性。人们常常看到的是夫妻间父权制的劳动性别分工,但很少看到代际间延续的父权制家庭关系。

当面对父亲——物质生活的重要提供者和学业方案的决策者时,青少年的内心是矛盾的,在尊君畏父的文化传统中,顺从还具有重要的伦理意义,孝顺是孝以顺为先。因此,在日益民主化和信息化的情境中成长的青少年对自我与自主有着明确的主张,但面对自己向往和羡慕的父权时,只能是服从,且其反抗注定是无力的或内化为身体的。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中,弑父的渴望是普遍的,这使得良心的结构包含了自我为中心和反社会的本能。<sup>②3</sup>有学者认为,如果西方文化是一种“弑父的文化”的话,中国文化就不妨被称为“杀子的文化”,这是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sup>②4</sup>可见家庭父权制以代际方式传递。

(四) 母亲的符号象征意义: 青少年否定性的自我

中国文化重视“严父慈母”,母亲是孩子与父亲之间的一面挡箭牌,使孩子无须去面对与严父

的决裂和自身成长的问题。因此,中国人即使与父亲对抗,甚至出现弑父的倾向,也不见得是真正的成长,因为总有母胎可以回归,这种现象甚至可称为“母胎化倾向”。<sup>②5</sup>

在4个案例中,母亲的形象都是温顺的,对父亲的权威只有不满和沉默,没有反抗。同时,母亲对孩子的学业又是焦虑的,会不断重复父亲的话。如询问带来的自我发现一样,孩子在母亲身上看到了未来的自己,体会到像母亲一样地顺从并不是自己想要的。这为儿子的自我认同带来了矛盾与分裂,要么认同父亲的权威,那等同于将自己确认为顺从的、令人无法忍受的母亲形象;要么是无力的反抗,因此反抗变得消极和自我毁灭,通过自我毁灭达到了毁灭父权的目的。

在家庭系统中,父权制统治发挥作用不仅是依靠强权的父亲本身,还有顺从于父权的母亲。在一个不断平权化的现代社会中,传统母亲的形象是充满矛盾的。一方面,她们为自己的孩子做出各种牺牲,容忍丈夫总以工作第一为名的抛弃,容忍丈夫的出轨,容忍丈夫对“是你没有教育好孩子”的指责。另一方面,她们对孩子有各种专制性的要求,承袭和复制了丈夫对妻子的等级化要求。一位顺从、隐忍和强势的母亲,对青春期的孩子来说投射的是失去自尊的形象。母亲作为隐性的父权统治的代言人呈现出子代不得不接受的爱的权威。

青少年矛盾的自我意味着他们会以父亲为榜样,认同父亲权威,并渴望成为一个强势的、能够主宰自己命运的人。一旦他们在同辈关系、师生关系、学业成绩等方面遇到挫折,便会迅速地承认父亲对自我的否定态度,认同自己做不成强者,但又否认认同母亲的“弱者”的命运。在青少年二元对立的观念中,做不成强势的父亲必然是做顺从的母亲那样的人,顺从对他们来说就是自我否定性。青少年分裂的自我是在自我界定中生成的。父母作为重要的他人通过“客我”与“主我”的询问使青少年体验到顺从与反抗的矛盾性,自律性的积极自我被这种矛盾性消解。事实上,青少年生活在多重权力关系中,他们要顺从的不仅有父母的权威,还有老师的权威和高考的制度性权威。无力反抗和无法顺从的出路可能就是身体化的消极反应了。如案例3,在国外求学的青少

年依然处于父权权威之下,其无法自立以及无亲人朋友支持的情况,使问题青少年的自我不断退缩、脆弱化,甚至要不断对抗自我的崩溃。此时任何的倾听、共情和支持都是他们渴望的。

#### 重建家庭关系: 倡导平权型亲子关系

面对青少年自我的矛盾性,其解决的办法和出路何在? 青少年社会工作、家庭社会工作和学校社会工作应从何处入手? 有研究认为,父权制的家庭关系必然产生青少年对于父权的认知与弱势者的自毁式的反抗。因此青少年社会工作和家庭社会工作的关键是改变对家庭关系模式的认知,倡导一种平权型的家庭关系,使家庭中每个成员之间形成可以相互支持的有尊严的关系。反抗行动不是要毁灭家庭关系,而是重建家庭关系。

案例4是相对简单的家庭系统问题,当身为母亲的自己遇到了丈夫的出轨和婚外生育时,她认为容忍丈夫的行为才会不影响孩子的学业。为此,笔者与李勤妈妈讨论了三个问题: 第一,你忍受不幸福婚姻的动力是什么呢? 第二,你为孩子忍受不幸福的婚姻和孩子讨论过吗? 第三,你想过孩子的感受吗? 你觉得儿子是成年人吗? 你把他当作过平等的成人吗? 你觉得为了孩子你忍受不幸福的婚姻,孩子会同意吗?

三个月后,李勤妈妈带着鲜花来找我,满脸喜气。她说“儿子免试进入重点高中继续读书了!”李勤妈妈说“我和儿子讨论了我的婚姻。他认同了我的婚姻是失败的,儿子非常赞同我离婚。我觉得我收入不低,完全可以独立生活,并养活儿子。没想到,他赞同我争取财产,他认为,我应当争取财产,那是我们应当得到的。”李勤妈妈一再表示,“和儿子讨论得很好,没有想到儿子那么成熟”。李勤妈妈没有想到的是,她自身为儿子树立了一个改变的榜样。当妈妈能够以尊重子女想法的态度来和孩子讨论问题时,已经是在实践平等的关系了。这种具有包容、理解与支持性的家庭关系一经产生,双方都是充满惊喜的; 儿子甚至和妈妈表示,他不玩游戏了,要考上一所好大学气爸爸,“告诉爸爸没有他,我们也能够过得很好”。母子之间相互信任和有尊严的新生活开始得如此简单。道理是不言自明的,那就是母亲的实践行动改变了人们对关系类型的认知,在人

与人的关系中,不是只有服从的关系,还有平等与支持的关系。平等与支持的关系是建立在信任和自主基础上的,由此青少年有尊严的、自我负责的、可承诺的生活得以展现。

案例1的解决方案是帮助王刚和王刚妈妈找到自身价值。王刚妈妈第一次认识到自己与丈夫的长期分居和疏于交流是有问题的,她开始思考自己想要怎样的生活,并慢慢接受儿子应当有自己的生活和选择。王刚不再逃学,因为他不去上学了。他回到奶奶身边,每天给奶奶炒菜做饭,他感受到的美好生活就是奶奶夸自己做的饭好吃; 他在计划重新开始自己的学业。父亲依然是个阴影,但奶奶给了孩子很重要的存在感。让青春期的孩子的自我愿望得到表达和倾听,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之一。

有学者提出实现助人自助有三种主要的服务逻辑,就是使案主具有反思、批判和反身性。反思注重个人在认识层面对其自身经验以及相关场景的回顾和检视,它以行动经验为服务维度; 批判关注个人生活的社会文化场景,通过对人际权力和结构等社会文化脉络的批判,培养孩子的自主意识和能力; 反身性则以社会位置动态关联中的自主意识和能力的培养为目标,对其进行审视和超越。<sup>②</sup> 母亲们具有很强的反思能力,在咨询过程中,她们很快地检视了夫妻关系的问题,承认自己一忍再忍的生活习惯,尽管很难对父权的文化和相关的权力机制提出批判,但都承认丈夫是大男子主义者。但对于母亲来说,反身性是双重的。一方面,她们需要认识到自己的顺从忍让和外强中干式的强势对待子女的态度难以建立起亲子信任; 另一方面,她们需要认识到改变父权制的家庭关系才是根本解决青少年身心健康问题的关键,尽管这还有艰难的道路要走。因为对诸多家长而言,他们就成长在父权制的家庭文化中,他们的生活经验就是男外女内、男强女弱,因此须给其时间,使其从一点一滴的实践行动开始作出改变。首先就是母亲们开始面对和表达自己内在的需求。当独立自主和平等表达获得正向的行动经验时,助人自助的目标就得以实现了。因此,第一步的工作常常是要求母亲能够听到孩子的声音,鼓励青少年说出自己的想法,无论其想法是自己多么不能忍受的,也要听完,然后一起分析孩子需求



的意义。很快,她们就能领悟到尊重的重要性。这本质上是一个知识的生产过程,是当事人参与和实践的知识生产。

但是让父亲们改变观念与行为,这一努力相当不理想。这也使人们清醒地意识到,父权制家庭关系的历史性特征和再生产的能力,它需要更多的平等关系的积极经验进入到日常生活中。

#### 理论讨论:尊重儿童青少年主体地位

面对问题青少年,首先要有系统、综合和整合的理论视角,要在社会系统和家庭系统中思考和关心青少年的身心健康。2021年9月国务院印发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在“基本原则”中多次强调了儿童参与。其中第5条明确规定“坚持鼓励儿童参与,尊重儿童主体地位,鼓励和支持儿童参与家庭、社会和文化生活,创造有利于儿童参与的社会环境。”多年来,这是首次明确提出有关“儿童主体地位”的概念。尊重儿童的主体对于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是家庭社会工作和青少年社会工作应当遵循的基本理念。

本文通过对4位求助问题青少年的家庭所进行的系统分析,展现了家庭关系中的权力维度。青少年问题的解决要在家庭社会工作服务中开拓平权型的亲子关系实践,建立积极的、包容性的、肯定儿童青少年内在自我和自尊的亲子关系。本研究倡导用代际平权之方法,重建家庭/亲子关系中的权力关系,帮助儿童、青少年建立有内在尊严的精神世界,将矛盾的自我建成内外价值统一的、不惧怕挫折的、有反思能力的自我。本研究可在相关理论领域进行进一步的发展和深化,特别是要深刻反思中国文化中等级权威式教育的多个面相,如师生关系,从青少年道德发展的层面思考纵向的权威等级关系与民主化的平权关系的复杂性和转型条件。有学者用儿童学习“表现好”这一事例分析中国教育文化的特点,解析“取悦权威”现象的道德演化基础。<sup>②1</sup>这一思考正呼应了“表现差”的符号意义及其呈现出的反抗权威的主体性成长。总之,建立个人的自主性原则是解决青少年问题的关键,换言之,就是要相信青少年能够拥有在其社会生活的环境中自由和独立行动的能力。这或许就是吉登斯意义上的“自我实现的政

治”,<sup>②2</sup>是社会发展可预期的拥有平等关系的未来。<sup>②3</sup>

- ①Fenghua Li, et al., “Prevalence of Mental Disorders in School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n China: Diagnostic Data from Detailed Clinical Assessments of 17,524 Individuals”,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Early View*, Vol. 21 (2021), p. 5. 原文中各项精神障碍患病率相加大于17.5%,可能存在类型重叠的情况。
- ②参见毕宪顺《多学科视角的问题青少年教育矫正研究》科学出版社2018年。
- ③①⑥爱利克·埃里克森《童年与社会》,高丹妮、李妮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8年。第3、3页。
- ④尚文鹏《“分而不离”:波士顿在家教育家庭的抚育逻辑与策略》,《开放时代》2017年第1期。
- ⑤迈克尔·P.尼科尔斯《消失的父亲、焦虑的母亲和失控的孩子:家庭功能失调与家庭治疗》,王尔笙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163页。
- ⑥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23页。
- ⑦周飞舟《一本与一体:中国社会理论的基础》,《社会》2021年第4期。
- ⑧参见熊秉真《童年忆往:中国孩子的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 ⑨杨菊华《新时代的家庭变迁及其政策应对》,《妇女要报》2021年第10期。
- ⑩李珊珊、文军《密集型育儿:当代家庭教养方式的转型实践及其反思》,《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3期。
- ⑪许丹红《当代中国家庭教养实践的类型化探索——基于质性资料的分析》,《中国青年研究》2020年第5期。
- ⑫朱安新、曹蕊《当前中国家庭的亲子关系:城乡和阶层差异模式》,《贵州社会科学》2019年第7期。
- ⑬高万红《多维度视角下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亲子关系研究》,王思斌主编《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第15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87—120页。
- ⑭吴真《转向、重构与余问——当代法国个体社会学的进路》,《社会学研究》2021年第1期。
- ⑮唐纳德·柯林斯、凯瑟琳·乔登、希瑟·科尔曼《家庭社会工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72—78页。
- ⑰⑱⑲⑳迪斯·巴特勒《权力的精神生活:服从的理论》,张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9、1—30、83页。
- ⑳参见R. D. 莱恩《分裂的自我:对健全与疯狂的生存论研究》,林和生、侯东民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
- ㉑郭戈《“丧偶式育儿”话语中的母职困境与性别焦虑》,《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

②②参见迈克尔·米特罗尔、雷因哈德·西德尔《欧洲家庭史: 中世纪至今的父权制到伙伴关系》,赵世玲、世瑜、周尚意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

②③参见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文良文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

②④⑤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174、180页。

②⑥童敏、罗敏敏《反思、批判和反身性: 实现“助人自助”的三种服务模式》,王思斌主编《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第15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44—56页。

②⑦许晶《道德从何而来: 心理认知人类学视野下的儿童道德发展研究》,《社会学评论》2020年第4期。

②⑧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三联书店,1998年,第251页。

作者简介: 佟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市婚姻家庭研究会研究员。北京,100871

(责任编辑: 毕素华)

## Obedience and Resistance: Adolescent Self – identity and Integration: Creative Practice of Equal Rights in Social Work of Family Relationship

*Tong Xin*

**Abstract:** Based on the family social work practice, This article examines how the type of family relationship impact on the adolescents self – identifies. Using the theories of self – identity, Psychoanalysis and power,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so – called problem teenagers are those who especially need help. They form separation self – identity to express their existence with negative resistances in the patriarchal family relationship. On the one hand, the patriarchal father produces the teenagers’ subject of obedience by the objectified inquiry; On the other hand, the symbolic meaning of mother’s obedience and tolerance to patriarchy strengthens teenagers’ negative self – identity. The practice of family social work is to establish teenagers’ positive self – identity with autonomy, dignity and commitment by rebuilding equal rights family relations. The promotion of equal rights family relation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families and the healthy growth of teenagers.

**Key words:** adolescent; patriarchy type of family relationship; separation self – identity; equal rights type of family relationship